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止说”献疑

——兼与学界两种代表性观点商榷

王学荣



【内容提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我国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20世纪50年代中止说”和“60年代中止说”。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中止，在六七十年代同样没有中止。这期间我们的事业尽管遭受了巨大挫折，但仍在继续。“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的十年间，毛泽东依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进行的重要体现。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止说”是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

作者简介：王学荣（1984-），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20世纪50年代中止说”和“60年代中止说”是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六七十年代（1966年-1976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尽管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失误，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仍在继续。只有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段历史，才能够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一致性的思想。

一

“50年代中止说”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的20年来，由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使‘左’的教条主义重新笼罩了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因此而中断”^①。另有学者这样写道：“历史教训了人们。中止于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70年代末终于又开始了。”^②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该观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就中止了，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这显然也是“50年代中止说”的代表。

而“60年代中止说”则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发展势头，并得到了延伸和发展。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

① 张焕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②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3页。

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但并没有中止。于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暂时中止。”^①另有学者写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笔者注）党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受到严重挫折，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②亦有学者说：“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当然也就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了中国实际。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以不计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就不算短了。尽管在这十年中，也有一些次要论点并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而占主体的指导思想却不是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断了十年。”^③

对于这两种观点，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中止，在六七十年代（1966年-1976年）同样没有中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仍在继续（尽管在这期间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遭受了巨大挫折）。而“20世纪50年代中止说”也好，“60年代中止说”也罢，共同点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曾经“中止”过，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二

这两种所谓“中止”，即是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完全停止了，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任何进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事实果真如此吗？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在曲折中前进！

1952年，毛泽东就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了。1953年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终形成。它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也深刻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体现。1949年-195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仍在继续，这是公认的，即便是持“50年代中止说”的学者也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1949年-1956年仍在继续。那为什么他们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止于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呢？这当然与1957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情况有关。

1957年下半年以后，国内国际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情况。加上我国当时还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发展规律尚未形成清醒的认识，等等。在如此众多因素的“历史合力”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左”的偏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相继出现了不少曲折甚至失误。这是历史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此段历史的“全部”吗？当然不是！道理很简单，因为尽管我们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却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看不到这一点，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难能可贵的。例如：毛泽东坚决反

① 祝猛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中止于20世纪50年代吗？——与杨奎松教授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 沈传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张静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几点想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

驳了有人提出的“要消灭商品、取消货币”的错误观点，强调指出，“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还主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①，这就是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笔者将其称为“哲学的经济”抑或“经济哲学”）。又比如：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通过反思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严厉批评了当时轻视商品经济的错误倾向，并将“价值法则”（或者叫“价值规律”）形象地称作“一个伟大的学校”。可见，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一再强调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难道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吗？

从另一个层面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例如，刘少奇提出“必须立足国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在“农业中要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创造性思想，这些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继续推进的又一印证！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中止了呢？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②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胡绳认为，在“十年探索”中（即1956年-1966年），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则是“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③。应该说，胡绳对这一历史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而“20世纪50年代中止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止于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在探索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失误与其为实现中国工业化所作出的贡献相比，贡献无疑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而失误毕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认为，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二十多年中，“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该书写道：“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④。应该说，该书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但遗憾的是，“50年代中止说”只看到探索中的“失误”，却忽视了处于主要地位的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该观点在这一问题上“失误”的根子所在。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② 陈文旭、孙宇：《试析〈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长白学刊》2014年第6期。

③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51-452页。

④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三

不可否认，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严重错误。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这段历史的全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第一，我们既要看到毛泽东在这段历史时期的确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他在这一时期同样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富有创造性的。例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晚年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江泽民同志也提出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著名论断。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都从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发展国防尖端科技的思想，这实际上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毛泽东关于发展国防尖端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也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这样说过：“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①他还指出，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②“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当然不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而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进行长时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这一战略构想，是对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难道还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试想，倘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真的“中止”了，倘若这个时期毛泽东真的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怎么能够提出像“三个世界”划分这样充满辩证思维的战略思想呢？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就全盘否定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段历史时期提出的正确观点。实际上，党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相继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都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或者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思想，事实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很多重要思想都是在这个时期酝酿和思考出来的。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继续的表现。倘若真的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中止”了，这显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段历史时期没有如何进展，毛泽东也没有提出任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正确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彻底停滞了。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所以，“60年代中止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止于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文化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2页。

大革命时期”是指1966年-1976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文化大革命”只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固然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党没有变质，国家并没有变质，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程也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并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文化大革命”并非“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部。这一时期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经济完全停滞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薄一波也曾经谈道：“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①

笔者认为，“60年代中止说”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退一步讲，即便单就“文化大革命”而言，“60年代中止说”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该观点只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却没有能够把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时期贯通起来理解，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反面经验。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探索出来的，正面经验与反面经验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起到了借鉴作用，“文化大革命”恰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反面经验。邓小平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②应该说，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全面的。可是，“60年代中止说”却将这段历史完全否定了，根子在于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即便单就“文化大革命”这一史实而言，“60年代中止说”也只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却没有能够把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贯通起来理解，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同样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反面经验，这当然也不是辩证的。

参考文献：

- [1] 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结合方式》，《长白学刊》2015年第3期。
- [2]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3] 何花：《从苏联模式到中国自主发展道路——论中国道路的选择》，《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4] 谭维克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丛》第3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编辑：张 桥）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2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